

花了快两万元治近视,视力反倒下降了

近视防控机构有多少“坑”?

新华社 王菲菲 马晓媛 马晓洁

“花了快两万元治近视,结果视力没改善,反倒下降了”……当前,近视防控机构生意火爆,但不少家长吐槽被“套路”。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商家通过渲染“近视焦虑”、虚假广告宣传等兜售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不菲,效果存疑,有的还存在危害青少年健康的风险。



效果与广告相去甚远

山西太原王女士的女儿正上小学,去年开始出现上课看不清黑板的情况,随后王女士留意到家附近的一家视力养护中心。该中心在街边发放9.9元体验卡,宣称通过按摩穴位,可将视力从4.5提升到5.0。心动之下,王女士带女儿去体验,并在商家劝说下办了三个疗程的按摩卡,每个疗程价格高达3800元。

此后,王女士的女儿一直在这家中心做“治疗”,但效果并不明显。半年后在医院检查,发现视力不仅没有改善,反倒从4.9降至4.6,屈光度也达到200度。

王女士说,这家中心还一直嘱咐家长不要去医院,说戴上眼镜视力下降更快、医院的眼药水等药物刺激会影响治疗效果。“三个疗程加辅助的保健品,总共花了快两

万元,眼睛没治好,视力反倒下降了,太后悔了。”

根据企查查提供的数据,近年来我国近视防控相关企业数量持续增加,截至2022年底已达968家。除了传统医院眼科门诊和配镜门店,形形色色的近视防控机构也受到不少家长青睐,有的通过“高科技”仪器进行眼部肌肉训练,有的用穴位刺激、中药热敷等方式干预,有的配套销售叶黄素、蓝莓饮、明目贴、明目膏等产品。

多名家长告诉记者,有的机构在宣传时说得天花乱坠,称“来的孩子95%都能提高视力”“训练以后可以不戴眼镜”,但实际效果远远达不到;家长质问时,一些机构就以“孩子配合度不够”“饮食和户外活动没跟上”等为由推脱。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面对商家机构关于近视治疗的虚假营销套路,76.6%的家长表示容易

上当。家长在近视防控中踩“坑”,72.2%的受访家长认为是想让孩子摘掉眼镜,心急所致。

记者走访发现,很多近视防控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菲。多款视觉训练仪售价都在万元左右,如果到店训练则每次收费50元到100多元。一些机构按疗程收费,单个疗程售价从几百到数千元不等。

“收割焦虑”的种种套路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机构利用家长对孩子近视的焦虑以及在专业知识上的盲点,设置重重套路。

——夸大功效虚假宣传。山西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由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下发的相关通知明确,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在广告宣传中不得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消费者。但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大量诸如“摘掉眼镜不是梦”“近视杀手”“已帮助10万+散光近视患者恢复”“治疗散光近视神器一贴看清”等明显夸大功效的广告宣传,还有一些机构频打“擦边球”,模糊“裸眼视力”“屈光度”等专业概念的差别,试图误导消费者。

——四处拉扯高端包装。不少机构对产品进行“高大上”的包装,但事实上,很多概念似是而非,合作性质也存疑。例如,不少产品宣传中提到的“贝茨原理”得名于100多年前一位名叫贝茨的美国眼科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翟长斌表示,这一原理主要是做所谓的变焦训练,不排除有一定作用,但缺乏足够数据支撑。此外,太原一家机构还宣称与山西省眼科医院某专家合作,但记者核实发现,双方并无合作关系。

——制定话术“忽悠”家长。某机构销售人员向记者透露了此类话术的具体内容。如,针对近视的孩子可以说提升视力,对不近视的孩子可以说提升远视储备;对训练后效果会不会反弹的疑问,不要直接回答,要强调平时用眼习惯的重要性以规避风险等。

多措并举 呵护未成年人眼健康

武汉普瑞眼科医院主任医师沈政伟告诉记者,目前近视的发病机制尚未明了,近视形成因素主要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因此防控主要围绕这两大点进行科普宣教。

“因研究发现离焦学说尤其是在视网膜上形成近视性离焦对近视控制有帮助,所以临床上角膜塑形镜、离焦型框架眼镜、离焦型日戴软镜或硬镜等能达到30%至70%的近视控制效果,是目前主流观点。”沈政伟说,对于使用一些眼部仪器、吃叶黄素和蓝莓果浆等方法,从循证医学角度来讲尚未发现对近视控制严谨科学的数据,对缓解疲劳及提供营养可能有帮助。

多位眼科专家指出,目前一些家长存在认识误区,认为只要进行了防控干预,孩子的度数就不应该涨,其实理想的目标是通过干预,将度数增长控制在较小幅度,避免孩子在成年之前发展为高度近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市场监管、药监等相关部门应当加大监管力度,创新监管方式,畅通举报渠道,促进近视防控市场规范发展。针对网络平台虚假广告现象,要压实平台责任,要求其设立鉴别机制,对近视防控相关产品的违规虚假信息保持高压治理。

少捕慎诉慎押,看浙江如何答好这道司法考题

(上接1版)

对“一升一降”的变化,长期关注中国刑事司法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认为,“在犯罪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刑事司法打击犯罪的应对模式也要从传统的惩罚犯罪观念,向治理犯罪观念转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王敏远在参加少捕慎诉慎押“三人谈”时,进一步明确表达了“少捕慎诉慎押”的观点。他认为,对于犯罪的治理,不仅要考虑打击犯罪,更多地要考虑如何将消极因素降到最低,甚至转化为积极因素,“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并不一定要羁押、逮捕,不一定要起诉、判刑刑。依法少捕慎诉慎押有助于犯罪消极因素的有效化解”。

为适应新时代、新变化以及人民群众的新需求,2018年年底,在经过试点的基础上,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21年4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实施、广泛适用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将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同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根据犯罪情况和治安形势变化,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严格依法适用逮捕羁押措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

浙江是“枫桥经验”发源地,“坚持矛盾

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这句话对浙江人来说,再熟悉不过。

随着社会发展,如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2019年7月召开的全省加强诉源治理工作部署会上,省委政法委会同省级政法单位出台《关于加强诉源治理工作的意见》,其中少捕慎诉作为深化诉源治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项关键举措,在全省推进落实。

这些年来,对轻微犯罪,如轻伤罪以及社会危害不大的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等类型的案件,司法机关相互协同,从矛盾化解、分化犯罪、减少对立、促进和谐角度,推进少捕慎诉慎押规范适用,努力做到“既治罪,也治理”。比如对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浙江省检察机关坚持“宽容不纵容”,在对情节严重者依法惩戒的同时,过去5年共对7463名情节轻微、悔罪表现较好的涉罪未成年人依法不起诉,落实帮教助他们回归正途。

浙江各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积极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以杭州为例,根据杭州市检察院在今年杭州市两会上的工作报告,2022年杭州市对涉嫌犯罪但无需逮捕的决定不批捕724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不判处刑罚的决定不起诉6115人,同比上升27.9%。

或许有人会担心,这样的做法会不会纵容犯罪的发生?

2021年,金华市检察院在全市检察机关推进少捕慎诉慎押改革,当年全市刑事

案件轻罪起诉率全省最低,诉前羁押率降幅全省第一。两年后,金华市检察院对全市不诉案件“回头看”,发现再犯率并未明显增加。

“通过轻微刑事案件不起诉,把社会矛盾化解在检察环节,既减少了诉讼对抗,节约了司法资源,又能有效预防犯罪嫌疑人被判刑后可能增加更多社会矛盾的负面效应。”武义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金丽说。

四

当然,少捕慎诉慎押不是一味地“不捕不诉不押”,而且“不捕”也并不意味着“不诉”,能不能捕、能不能诉,始终以法律为准绳。省检察院出台相关工作规则,严格区分不同情形,依法当宽则宽、该严则严,推动少捕慎诉慎押精准落地。杭州市富阳区检察院在办理曾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中,在审查批捕时对曾某依法不批捕,在审查起诉时根据证据变化依法认定曾某为主犯,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具体案例向社会传递“不捕”并不等于“不诉”,守牢司法公正“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机关还探索运用大数据,让轻罪不“关”也能管住。杭州研发“非羁押”,通过外出提醒、违规预警、定时打卡和不定抽检等科技手段,探索刑事诉前非羁押人员数字监管模式,扩大非羁押手段适用;衢州市柯城区研发“检警+”应用,加强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完善捕前诉前会商机制,

精准落实少捕慎诉慎押;舟山市定海区检察院根据犯罪情节、身份作用、悔罪表现对信息网络犯罪嫌疑人“群体画像”,研判其社会危险性,进行分级处理。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发挥公开听证在解决争议、促进矛盾化解中的积极作用,对不捕不诉案件“应听证尽听证”,把不捕不诉权置于阳光下。对不起诉案件,通过不起诉后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方式,做好“后半篇文章”,助推社会治理。

由变化而思考,从考题到解题。在经历不懈探索、辛苦跋涉之后,如今,我们回望少捕慎诉慎押给浙江带来的变化,数据仍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近两年来,浙江报捕率、不捕率、诉前羁押率实现“三低”,尤其是体现少捕慎诉慎押关键质效的诉前羁押率,2022年降至18.48%,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比全国的26.7%低8.22个百分点。

少捕慎诉慎押,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一头连着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切实感受。这些年,与轻刑犯罪上升、重刑犯罪下降这“一升一降”相对应的,是浙江人民群众安全感的上升。到2021年,浙江人民群众安全感达99.19%,高于全国平均值0.57个百分点,已连续五年上升,浙江被认为国内最具安全感省份之一。随着少捕慎诉慎押的深入贯彻落实,更多的矛盾纠纷在源头化解,司法机关办案质效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收获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